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

朱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

朱 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朱英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298-6

I. ①辛… II. ①朱… III. ①资产阶级—关系—辛亥革命—研究—中国 IV. ①D691.71②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124 号

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

作者:朱 英 ©

责任编辑:陈良军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4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定价:6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形成	(1)
一	学术界有关论述评介	(2)
二	资产阶级组织程度的提高	(6)
三	资产阶级近代意识的增强	(10)
第二章	资产阶级的特点	(15)
一	独特的产生发展道路	(15)
二	持续过渡性特征	(25)
三	较强的依赖性	(35)
四	内部结构失调	(47)
第三章	资产阶级与革命派的关系	(52)
一	代表与被代表者严重脱节	(52)
二	资产阶级疏远其代表的根源	(59)
三	武昌起义期间的发展变化	(67)
四	资产阶级的错误选择	(77)
第四章	资产阶级与立宪派的关系	(87)
一	立宪派对资产阶级的争取	(87)
二	资产阶级对宪政的向往	(93)
三	参与立宪请愿运动	(97)

第五章	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与影响	(106)
一	西欧与日本等国官商关系的特点	(106)
二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关系	(112)
三	清末官商关系的发展变化	(122)
第六章	资产阶级社团的兴起	(143)
一	商会	(143)
二	商团	(158)
三	地方自治团体	(170)
四	资产阶级社团的影响	(187)
第七章	资产阶级与反帝爱国运动	(195)
一	拒俄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195)
二	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	(200)
三	收回利权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210)
第八章	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的首次尝试	(222)
一	拟订商法活动的发起	(222)
二	商法讨论会的召开	(227)
三	拟订商法活动的影响	(231)
第九章	资产阶级与“二次革命”	(238)
一	袁世凯对资产阶级的笼络	(238)
二	“二次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245)
三	“二次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的政治表现	(250)
第十章	资产阶级与护国运动	(259)
一	资产阶级与袁世凯之间的裂痕	(259)
二	资产阶级与袁世凯的决裂	(264)
三	支持护国反袁斗争	(268)

第十一章 苏州商会的产生与特点——个案分析之一	(277)
一 抵制美货运动——苏州商会诞生的催化剂	(277)
二 独具特色的组织系统	(281)
三 别具一格的成员构成	(285)
四 反帝较坚决与反封建软弱的政治性格	(289)
第十二章 苏州商会与行会之比较——个案分析之二	(298)
一 苏州行会概况	(298)
二 苏州商会与行会的本质区别	(301)
三 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历史联系	(310)
第十三章 苏州商会的司法职能与影响——个案分析之三	
.....	(316)
一 争取受理商事诉讼权	(316)
二 受理商事纠纷概况	(318)
三 影响与局限	(322)
附录一 最近十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综述	(327)
一 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	(327)
二 民族资产阶级的阶层划分及构成特点	(329)
三 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331)
四 资产阶级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	(334)
五 新式商人社团研究	(337)
附录二 开拓近代中国商人文化研究的构想	(343)
跋	(354)
后 记	(356)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形成

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探讨，理所当然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尤为重要的课题。而资产阶级何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队伍，换句话说也就是何时形成一个阶级，则是研究资产阶级首先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因此，本书将这个问题列为第一章加以分析。

海外曾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并进而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此，国内已有学者作了多方面阐述，证实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具有一定影响，辛亥革命无疑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本书不再赘述。^①

国内绝大部分学者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一结论均无疑义，但究竟何时形成，则众说纷纭，似无定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故本章拟在分析以往有关见解的基础上，着重从组织发展程度和思想意识的变化这两个新视角，论述辛亥革命前商会的诞生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

^① 可参阅章开沅的《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丁日初的《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以上两文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汪敬虞的《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

一 学术界有关论述评介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迄今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相应产生。^①持此观点的论者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说明，只是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两段话作为依据。为便于理解，将这两段话转引如下。列宁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③

上引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都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任何一个“阶级”，从其产生到最终形成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起初所产生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成员，当其成员越来越多，并且通过自己的组织或政党，凝聚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之间有了明确的阶级认同感，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出现，才能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因此，不能将某个阶级内部成员的出现，直接说成是某个阶级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资本家的出现是比较早的。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业，一些传统商业也逐渐向新式商业转化。那些经营新式商业的商人，可以说就是商业资本家。与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转化相伴随，一些传统商人也逐渐向近代商业资本家转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诞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工业资本家，而且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工商业资本家出现之后，虽然在社会经济生活

①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0页。

② 列宁：《共青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2～3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90页。

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尚不具备独立阶级队伍的基本特征和自觉意识。他们彼此没有紧密的组织联系，被隔绝分散在为数众多、互相排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之内，缺乏明确的阶级认同感。这时，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资本家的力量也比较有限，因此在引进西方机器设备，肇始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在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权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开明改革派以推行洋务运动的方式，扮演了发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资本家只是担任了配角。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阶级形成的发展过程作过论述，前引列宁和毛泽东的两段话，实际上也包括资产阶级内部成员即资本家的产生，并不能理解为单纯指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即已产生的观点，直接将个别资本家的出现等同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形成，显然是将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混淆了。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观点也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赞同。

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①。

以往的有关论述，大多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充当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时期的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维新派和立宪派主要代表和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与愿望。这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主要依据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里姑且不谈维新派和立宪派是否仅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即使承认这一点，也很难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因为这涉及另外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即阶级的政治代表与阶级主体。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主体的产生发展，并非亦步亦趋，往往有超前或滞后的现象，所以也不能将两者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8～499页。

等同视之。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动荡频仍和各派政治力量消长急剧，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发展脱节的状况更为突出。如果单以政治代表出现，就断定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或阶层已经形成，这在政治思想超前产生，社会物质基础滞后发展的近代中国，难免失之偏颇。

考察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程度，也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能以独立社会力量姿态出现的资产阶级。不容否认，当时的资本家在人数上已进一步增多，实力也有所加强，但他们彼此之间仍仅仅只有行业或乡谊等十分狭隘的联系，组织的发展程度没有什么变化，思想上尚无明确的阶级认同感，也就是说仍不具备自觉的阶级意识。因此，不能说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资本家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是与其发展状况相吻合的。由于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在戊戌变法这样一次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看不到各行业的资本家互相联合起来，集体表露自己的态度和采取统一的行动。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的组织或机构，能统一代表整个工商业者的利益，直接表达他们的要求，领导他们参与变法运动。从整体上来看，工商业者对戊戌变法并未予以多大的关注，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行动，只有少数资本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一些变法活动。而在20世纪以后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中，工商业者却无不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互相协调配合，公开表明其政治态度，并采取相应的统一行动。从这一重要侧面，即可看出戊戌时期的资本家尚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戊戌变法以前，投资于商办新式企业的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买办、地主和官僚的地位与立场，只是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化。所以，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①

^① 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第三种意见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述，是目前论述资产阶级形成方面最全面的一种观点，视野和角度较前均有所拓展，不仅涉及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直接考察了资产阶级主体的自身发展态势，因而更具说服力，得到多数学者的首肯。目前，大部分近代史教材和有关著作都采用了这一观点。如果说仍稍有不足，那就是对资产阶级主体的考察尚欠充分，特别是未从资产阶级的组织发展和思想意识变化方面进行分析。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间界定，似乎也过于宽泛。

1983年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曾就资产阶级何时形成进行过讨论，但意见颇为分歧。有的学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也有人认为，经济是一个复杂、相对的因素，很难用工厂或商业的基本的数字来判断资产阶级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形成。而政治斗争则有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因此在各种因素中可以着重考虑政治因素，发生维新运动的19世纪90年代，即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形成时期。还有的强调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来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起点应是19世纪40年代，完全形成则是在19世纪末。^①

以上说法因系在发言中提出，大多论证不充分，也欠严密。同时，由于缺乏一个准确而统一的标准，论者之间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侧重政治因素，其结果必然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综合以上介绍的各种意见，不难看出学术界对资产阶级何时形成这一问题的探讨非常活跃。尽管尚未获致完全统一的认识，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启迪。但是也应看到，以往的探讨在视野上仍嫌狭窄，有一定局限性。我认为，目前应着重加强对资产阶级本身发展状况的考察，尤其是探讨其组织发展程度和思想意识的变化。这样，或许能够对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获得比较清晰的认识。

① 参见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